

“老怪物”传奇 (上)

袁养和

楔子

他曾投奔延安,也曾走出国门。
他上过天堂,也下过地狱。

他的一生是一部梦幻般沉浮起落的悲喜剧。

三十刚出点头,他就当上了共和国最高新闻殿堂——新华社的党委书记。他在出访保加利亚时拍的肖像照,因为仪表出众、神采飞扬,竟被保加利亚首都照相馆陈列在橱窗里。在新华社的周末舞会上,他的才华和风采吸引了多少女记者深情的眼波呵!然而,转眼之间,他成了个靠工分吃饭的普通农民。在江南的田野上,他赤着双脚,卷起沾满泥水的裤管,坐在田埂上,默默地吞吸八分钱一包的无牌香烟……

当他重返“人间”时,他已垂垂老矣!他早已同当今的潮流格格不入,然而他依然坚守着他的“延安精神”特立独行。从此,“老怪物”这个称号便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,传遍了大江南北。

嗟乎,“怪物”也者,妖耶?魔耶?喻之于人,甚矣哉!

然而,我却喜欢他这个绰号。

二十多年前,我曾以他为原型,创作了中篇小说《老怪物出山》;其后,在我的长篇小说《海城之谜》中,他又演绎了另一个重要角色。然而,现实生活要比文艺作品精彩多了,尽管他当年与周恩来副主席的戏剧性会面,我曾原原本本地写进了小说,但是在朝鲜战场上,金日成将军握着他的手说:“普金同志,我要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!”还有,他与他的三任妻子的悲欢离合又是那样的催人泪下……这些,在我的小说里都未曾留下一点痕迹。

不久前,他与世长辞了,享年86岁。

他受到了世人深深的怀念和敬仰。

凭着我与他的忘年之交,我深感有必要用我的笔,还他本来面目。

▶普金出访保加利亚时拍的肖像照,被该国首都照相馆陈列在橱窗内。



(三) 他成了“老怪物”

感情问题断了以后,他一心一意投入了工作。然而,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,他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和冲突日见频繁了。

为了沟通市场信息,为各类企业发展生产提供方便,分社与工商部门联合,组织出版了一套工商企业名录。分社将其中一部分稿酬,作为“劳务费”发给参与编辑名录的人员,同时也拿出一部分稿酬作为奖金发给职工。钱虽不多,但却人人有份,皆大欢喜。普金自然也发到一份,然而他却很不高兴。在一次全社人员大会上,他冷不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,脸色严峻,言辞激烈,直抒胸臆:“我不赞成分社搞创收。新华社是党中央的耳目喉舌,记者应该为党中央站好岗、放好哨,怎么可以搞这种名堂呢!严格说来,这是不务正业!再说,我也并没有参加搞名录的工作,怎么好无功受禄呢!我宣布,我发到的钱,作为党费,全部上缴。”

沉默,难堪的沉默。与会人员目瞪口呆,不知所措。

我即刻联想到总社秘书长陈小和告诉我的一件事:建国初,总社按上面的规定,要给一部分领导干部提级,当时已是行政11级的普金也在此列。可是,他却在大会上带头表态:“我的级别已经够高了。拿我所做的贡献来比,我感到惭愧不安。为此,我恳求组织上不要给我提级。”此言一出,那些欣欣然一心等着提级的人全都气昏了头。显而易见,普金此举把他们的晋级之路挡住了。后来,普金在政治上倒了霉,这些人的反应只有两个字——“活该!”

真所谓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,过了几十年,吃了那么大的亏,普金的老脾气依然没有丝毫改变!这以后,分社的“创收”照常进行,普金的“奖金”却变成党费上缴了。在分社内部,他坚持原则,毫不妥协。在分社外面呢,他同样恪守清规,不讲情面。他下基层采访,往人还未来,有关他的新闻就传来了。

江阴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,有一次,他陪老普到本地的先进单位山观乡采访。历来

好客的山乡领导听说来了一位特级记者,分外热情,特地用山区的土特产准备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席。不料老普来到食堂,见到酒席,脸色陡变,扭头就走。众人劝的劝,拉的拉,七手八脚,一拥而上,可是怎么也拉不住他。他径直跑到食堂窗口,要买饭菜。眼见一桌酒菜凉在那儿,众人尴尬至极,坐也不是,走也不是。食堂的师傅呢,眼瞅着乡领导,却不敢将饭菜卖给普金。乡领导万般无奈,只好曲意恳求:酒席已摆,无论如何给个面子吧。谁知普金一点面子也不给!他沉着脸,锐利的目光直逼乡领导,慢悠悠地说:“我想问问,办这桌酒要花多少钱,我们这儿的农民一年能挣几个钱?”这样的问题,叫人怎么回答?其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。

在张家港,普金的故事更加精彩。县招待所因为他的到来,给他安排了一个套间。宣传部的同志送他去住的时候,他竟然没有任何推让。但是,过了一会儿,当县委领导去招待所看望他时,到那套间撤了半晌门铃,却无人开门。到服务台一打听,才知普金已经擅自搬到“通铺房”去了,为此事,他跟服务员还发生了不小的争执,服务员拗不过他,不得不同意的要求。

县领导来到那房间,只见屋里摆着四张床铺,一应设施简单而粗陋,而且没有卫生间,光线也显得暗淡,根本无法与宽敞舒适的套间相比。此刻,普金正弯腰坐在床沿上戴起老花眼镜埋头看报,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质烟草的气味。见县领导硬要他搬回套间,他慌不忙,笑嘻嘻地摆出住进通铺房的理由:一、几十年来,他住惯了条件简陋的乡村土房,如今要他住如此高级的套间,心里不踏实,他会一夜到天亮睡不着觉,哪怕吃安眠药也没有用;二、作为记者,要尽可能多接触群众,住在通铺房,有利于了解民情……县领导害怕他真的会通宵失眠,出了问题,担待不起,只好尊重他的意愿。但从此,“老怪物”的美名伴随着这些故事,在苏南和苏北不脛而走。

(一) 新来的“特级记者”

那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三年初春,原本以采写新闻为业的新华社江苏分社的大院里,忽然传开了一条“内部新闻”:分社即将进来一位年近花甲的新记者,此人原是新华社的“铁腕人物”,1959年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,惨遭厄运,被遣返老家当了农民;如今落实政策,重回新华社,总社给他安排了重要的领导职务,可是他却坚辞不就,死心塌地要回江苏当一名普通记者。总社考虑再三,决定尊重他的意愿,但是却破格给了他一个响当当的头衔:特级记者。

记者本来已是“无冕之王”了,竟然还要冠之以“特级”!在“文革”结束不久,知识分子均无职称的年月,这是何等骄人的殊荣呵!其含金量并不亚于传说中唐明皇赐给李太白的那块金牌!

身为新华社记者而对文

学情有独钟的我,即刻对此事投入了特别的关注。我等待着这位特级记者的降临。不久,他终于来了。在分社大院的一棵郁郁苍苍的雪松下,他穿一身过时而陈旧的草绿色军装,拎着十分简单的行李,歉笑着向人打听分社招待所住处,那风尘仆仆的样子,就像一个刚从前线退伍的老兵。他1.7米以上的个子显得分外清瘦单薄,但是一头浓密的黑发却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称;两条又黑又浓的剑眉下,一双锐利的眼睛射出逼人的光芒。双眉之间的三条竖纹,给他的狭长脸平添了几分刚毅;而瘦削的双颊之间的两条八字沟,却如刀刻斧砍,深嵌皮肉!这深沟,使我看到了一种令人心悸的沧桑,也看到了一种咬紧牙关的沉默。他必定吞咽了太多的苦水!

普金的来临,在分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,但是,他对分

社第一把手老程的震撼却远远超过了对我们这些普通记者。二十多年前,当老程在新华社西北野战军总社供职时,这位叫普金的总编辑就是他的老上级;时至今日,早已位居高干行列的老程,仍然要比普金下台之前低一级!何况,普金还是总社“册封”的“特级记者”。有鉴于此,他诚惶诚恐,小心翼翼,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来领导这位新来的老上级!

不久,我们见证了老社长的尴尬和困惑。在农村编辑室一次临时召开的会议上,老程将普金介绍给我们,然后斟字酌句地说:“老普同志过去是我的老领导,如今他由总社派到江苏来工作,他希望多关心一点农村……”他的话还未落音,普金便笑着打断了他的话:“程予同志,过去的事,别提了。我现在是新华社江苏分社的普通一兵,我喜欢同农民打交道,我想当一名农村记者。从今天起,我向你保证,我无条件

地服从你的领导。”接着,他又恳切地希望农村组的每一位记者多给他指点和帮助。他说,他毕竟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太久了,何况他年事已高,脑子已经老化了。

他说到做到,几天后,就单枪匹马到苏南农村去采访了;回来的第二天,他就到农村组的业务会上汇报采访情况。开初,我很为他担心,就凭他“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太久”和“脑子老化”这两点,他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吗?然而,出乎我意料之外,他的汇报有血有肉,头头是道,既有基层单位的先进经验,又有面上值得注意的问题,还有他个人的分析和看法。更令人惊叹的是,在汇报这些情况时,他根本不看采访本,一些重要的数据从他嘴里连珠似的吐出来,居然毫不费力!我忍不住在我的采访本上一连写了三句话:“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”、“生姜还是老的辣”、“不是孙大圣,不上花果山!”

(二) 尴尬的婚姻问题

这年仲春,新华社总社秘书长陈小和陪同朝鲜通讯社新闻代表团到南京访问,我与分社社长程予一起参加了陪同。这期间,陈小和多次问起普金的情况。从这位性格豪爽的秘书长那儿,我终于打听到,普金不仅早年当过新华社西北野战军总社总编辑,解放后还当过新华社国内部、国际部的负责人,抗美援朝时曾赴朝鲜担任志愿军总社副社长,并且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;回国后,他又出任了总社的党委书记。据陈小和回忆,在总社历任党委书记中,普金的工作是搞得最活跃的;年轻有为的他,在新华社周末舞会上风流潇洒,指挥倜傥,每舞一曲,常身手不凡,令人倾倒,以至于几十年后,那情景仍叫人难以忘怀。

“他不愿回总社任职倒也罢了,最伤脑筋的是他的婚姻问题。”陈小和颇为为难地说。他告诉我们,普金前后结过三次婚。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刘衡,是人民日报的记者,也

是个极有个性的人,两人结婚不久,适逢“反右”斗争,刘衡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,再加上性格不合等原因,两人很快就离婚了。普金的第二任妻子高向明,原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名翻译,两人结婚不久,普金因为反对“三面红旗”被打成“阶级异己分子”,又不得不离了婚。后来,普金回到武进县湖荡桥当了农民,赤手空拳,无以为生,多亏死了丈夫而没有改嫁的弟媳蒋芝英拼死拼活,挣工分养活了他。

以后,他就同这位恩重如山的农村妇女结了婚。现在,刘衡已是人民日报的名记者,高向明也当上了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。这些年来,她们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吃了多少苦,盼星星,盼月亮,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,普金总算有了出头之日,她们做梦也巴望原来的丈夫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。然而,要重新调整,谈何容易!其结果必然是——人高兴,其余两人只能是涕泪长流,柔肠寸断,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了。

我们问陈小和:“三个女人,你看选择哪一个为宜?”老陈笑了笑,坦率地说:“我同总社许多老同志一样,倾向高向明。”他分析说,刘衡虽是普金的原配夫人,但两人个性都强,平时冲突不断,生活难得幸福;农村的那位夫人,虽然有恩于普金,但毕竟没有文化,缺少共同语言,谈不上真正的爱情;惟有高向明,与普金门当户对,情投意合,最是般配!为此,他打算再请别的同志一起做工作,动员说服普金,尽可能促成这桩好事。

听了老陈的话,我不禁为武进乡下那位农村妇女暗暗叫苦,但是老陈的分析确实也无懈可击,他的那份心意似乎也无不可厚非。我想,若是人有孙悟空那样的本事,拔根汗毛一吹,就能变出若干个自己,岂不美哉!可惜这是个无法实现的神话。看来,那个乡下女人注定要失去普金,孑然一身,痛苦一世了。

没有多久,该发生的事果然发生了。我先是从江阴县宣传部获知,人民日报记者刘衡忽然来江阴采访。接着,江阴报道组传来消息,新华社特级

记者普金也到了江阴。其中的奥妙,惟我心知。然而,我进一步打听,却没有下文。过了几天,普金回来了。他告诉我,他要上北京总社去一趟。我问:“是去送稿子吗?”他说:“要去处理一点个人的私事。”不出所料,情况果真按陈小和的思路在发展了!

大概一星期后,普金从总社回来了,办公室里又响起了他爽朗的笑声。我审慎地问他这次北京之行的收获,并适当透露了一点陈小和所说的内情。他即刻摇摇头,笑了起来,说:“他的一番好意我只好心领了。我不能这样呵。”接着,他点了支烟,大口大口地抽起来,沉思有顷,缓缓地说:“我反复考虑,人总得讲点良心。我的乡下爱人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同我结合的,没有她,也许我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在三个人中间,她是个弱者,她是经受不起这么大的打击的,如果我要离开她的话,至于刘衡和高向明,她们都深明大义,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。我欠她们的债,只能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,他的眼眶里闪烁着泪花。我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……

(四) 他接受了我的“采访”

自从普金被群众封为“老怪物”之后,我对他平添了几分敬意。我迫切地想知道他的历史,我要弄清他之所以会变成“老怪物”的来龙去脉。

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机缘,就是陪他出去采访。那是一个初秋的黄昏,我同他一起住进了江阴招待所古朴的西厢房。窗外,桐荫沉沉,竹影摇曳。清幽的月光泻进窗户,同屋里的灯光交融成一片。四下里万籁俱寂。他被我的诚意所打动,爽快地接受了我的“采访”。

他从我额头上的一小伤口说起。他说,他从小脾气就倔又犟,凡是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,他会一往无前,坚持到底,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后悔。在中学里学了降落伞的常识以后,为了验证降落伞的功能,他不顾同学的劝阻,竟撑开一把雨伞,从常州的城墙纵身跳了

下去。当他拣起散了骨架的破伞,捂着鲜血淋漓的额头,从地上爬起来时,同学们都笑得前俯后仰。

中学毕业后,在中学当校长的父亲,让他到当时在徐州当专员的一个昔日学生手下工作。尽管他受到很好的照顾,但是受了新思潮冲击的他却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。那位信奉“三民主义”而又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不但没有留难,反而写了封举荐信,介绍普金到延安去找他的老同学。普金激情似火,从西安下了火车,竟迈开双脚,一路走到延安。靠那位朋友帮助,他进了延安抗大,以后又进了鲁艺。他与冯牧、穆青住一个窑洞,三人志同道合,情同手足。按年龄,冯牧是“大哥”,普金是“二哥”,穆青是“三弟”。几乎同时,三人都进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当了记者、编辑,后来又一同转为新华社记者。(未完待续)